

纪明堂 石玉修 主编

现代医学模式

XIANDAI

YIXUE MOSHI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05
5

序

医学科学的发展在高新技术应用和微观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医学发展不能仅限于此,它们不仅不能解决医学目的的根本转变问题,而且还带来卫生资源的浪费和医疗费用过度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医学发展还必须在另一个坐标系上有所侧重,就是要加快全域性医学发展,使医学领域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向心理、社会领域扩展,也就是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医学模式的研究在我国已有10多年的历史。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来愈多的医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的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医学模式的宣传、教育不够广泛、深入,相当多数的同志是在传统的生物医学的模式下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内涵知之不深。因此,对它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还需要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由纪明堂等编写的《现代医学模式》一书,是一部有一定理论深度,较为全面、系统,深入探讨医学模式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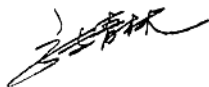
作者依据系统论的观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神学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四种医学模式在各自历史时期的发展概貌,阐述了医学模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概述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新

兴学科、医学实践、医院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并为“21世纪改造医学模式”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促进医学模式的深入宣传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本书作者均为活跃在医学战线上的工作者,具有丰富的经验。作者在书中向广大医学工作者建议:在临床、护理、预防、教学、科研工作中,要转变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自觉实践新的医学模式,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医学观,提高以人们生命质量为主要目的的科学技术水平。

作者积累了7年资料,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籍和文章,七易其稿写成此书。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令我钦佩。当作者殷切地请我为此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时,虽然对医学模式以及涉及到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医学的目的方面的知识知之不深,但我仍欣然同意了。因为介绍给大家几位年轻有为的医学工作者,推荐一本有价值的、能够引起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书,毕竟是一件对医学和社会各界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写了这些,是为序。



1997年10月于济南

前 言

“医学模式”的研究在我国已有 10 多年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来愈多的医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的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医学模式的宣传、教育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相当多数的医学工作者对医学模式的内涵知之不深,或缺乏系统了解;有人则认为医学模式既解决不了临床病症,又代替不了听诊器、手术刀,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观点,仍拘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坚持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从而影响了医学工作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了宣传、普及医学模式知识,促进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改变单纯生物医学知识结构,转变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探索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科学的医学观,提高医学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实现以病人为中心,做一个新型的合格医生和护士,我们编写了《现代医学模式》一书。

在编写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根据现代医学发展的客观趋势与要求,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理论医学最新信息,系统介绍了医学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详细阐述了“医学模式”的内涵;着重介绍了“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宏观与微观、心理与社会诸方面论述了“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而较客观地揭示了医学发展规律,为医学工作者和医学院校学生全面了解医学模式,拓

宽临床、教学和科研思路,激发学习兴趣,发掘创造潜能,提供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为构建现代医学新体系展示了参照坐标。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著作和资料,所以,不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它还凝聚着我国10多年来理论医学、心身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辩证法等研究的结晶,蕴涵着研究、关心和积极倡导“现代医学模式”人们的奉献和渴望。毫无疑问,它的出版将给蓬勃发展的现代医学增添光彩。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卫生厅、莱芜市卫生局、莱芜市人民医院、莱芜市杨庄镇医院、肥城市中医院、山东省泰山疗养院的大力支持。大连《医学与哲学》杂志社、山东医科大学图书馆、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泰山医学院图书馆提供了有关信息资料。初稿脱稿后,赵锡吾教授给予精心指导。刘润来、薛晓彤先生对有关中医学名词、术语作了认真审阅。山东省卫生厅保健处崔佃水同志,山东省泰山慢性病医院刘洪霞、窦学荣、于文武、杜翠兰、邱丽、张淑莲以及泰安市文化出版局刘志军等同志给予大力帮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所收集的资料尚不够全面,本书虽经七易其稿,但某些观点、提法仍难免偏颇或欠妥,但我们矢志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的潮流。谨此,恳切地希望有关专家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深入探讨、研究、发展、完善现代医学模式。

纪明堂

1997年10月2日于泰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医学模式概述	(1)
第二节 医学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6)
第三节 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模式的评估	(17)
第二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实践	(25)
第一节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临床医学	(25)
第二节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系统化整体护理	(38)
第三节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教育	(45)
第三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院管理	(59)
第一节 医院管理概述	(59)
第二节 系统科学与医院管理	(65)
第四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新兴学科	(72)
第一节 医学新兴学科的范畴	(72)
第二节 医学新兴学科的基本特点	(74)
第五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心理学	(77)
第一节 医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77)
第二节 医学心理学主要分支学科	(81)
第三节 我国现代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概况	(84)
第六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心身医学	(86)
第一节 心身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86)
第二节 我国心身医学的研究及其意义	(89)

第三节	心身疾病的概念及其分类	(91)
第七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社会医学	(94)
第一节	社会医学的由来与发展	(94)
第二节	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	(97)
第三节	社会医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相关学科	(98)
第八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行为医学	(101)
第一节	行为科学	(101)
第二节	行为医学	(103)
第三节	行为治疗	(107)
第九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康复医学	(113)
第一节	康复医学的发展史	(113)
第二节	我国现代康复医学的发展概貌	(115)
第三节	康复医学的研究对象	(119)
第四节	康复医学学科体系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120)
第十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学伦理学	(122)
第一节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回顾	(122)
第二节	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研究概观	(124)
第三节	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128)
第四节	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	(134)
第十一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心理卫生	(137)
第一节	心理卫生史的回顾与发展	(137)
第二节	心理卫生研究的范畴及其相关学科	(141)
第三节	心理卫生要达到的标准	(142)
第十二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老年医学	(144)
第一节	老年学与老年医学	(144)

第二节	老年医学的研究范畴·····	(145)
第三节	衰老研究的相关学说·····	(146)
第十三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预防医学·····	(151)
第一节	古代预防医学思想·····	(151)
第二节	现代预防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152)
第三节	预防医学的研究内容·····	(157)
第四节	预防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159)
第十四章	医学模式的转变与护理心理学·····	(161)
第一节	护理心理学的任务·····	(161)
第二节	心理护理措施·····	(162)
第三节	护理心理学的发展和现状·····	(163)
附录	名词解释及有关术语分析·····	(165)
主要参考文献 ·····		(188)

第一章 绪 论

医学模式作为对医学科学的理论概括,不仅反映出医学科学的总体概貌,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人们进行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对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节 医学模式概述

医学模式是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1980年,黎风将其介绍到我国国内,引起国内医学界、心理学界、哲学界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关注,随即医学界从医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开始了医学模式问题的研究。目前,愈来愈多的医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的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重要性,医学模式的研究正逐步向纵深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逐渐向医学各个领域渗透。

医学模式属于哲学范畴,但它并非是哲学,亦不能作为其同义词。它们之间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根本的区别。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医学模式则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医学科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医学科学中的“世界观”。医学模式与哲学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一、医学模式的概念及其意义

医学模式是指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现象的总的看法、基本观点和实践原则,亦称医学观。它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医学对疾病和健康总的特点和理论的概括,反映着一定时期人们对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对疾病的认知及评价方式,反映着一定时期医学研究的领域和范畴,反映着一定时期医学研究的方法和目标。

医学模式作为医学观,对医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对医学科学和临床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国内外医学家、心理学家热烈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医学要全面揭示人体生命活动和防治疾病的客观规律,对客观和实验事实进行整理加工,同样需要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即使对任何两个最简单的事实,也难将它们联系起来。要思维就必须有一定的逻辑范畴,而医学模式则为科学思维提供了必要的范畴及科学思维的医学观和方法论。

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疾病谱的转变,用单纯的医疗经验指导临床实践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强烈的健康要求,用单纯的医疗经验指导医学实践已有碍于医学科学的纵深发展。医学社会化是现代医学的主要特征。因此,现代医学要求从宏观到微观、生理与心理、社会与环境以及家庭功能、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研究其机制和原理。所以,医

学模式作为一个理论框架,作为医学观,它在医学科学研究、医学教育、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护理中,对医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医疗行为和临床护理过程等方面具有强有力的束缚和制约作用以及启迪和开拓作用;同时,又在医学科学实践中,决定和反映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状态、方向和目标,决定和反映着医学教育的体系、结构和内容,决定和反映着医疗卫生工作的社会职能、道德义务和作用,决定和反映着医学工作者研究和处理健康与疾病关系的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等。

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疾病谱的改变,医学模式也由低级向高级形式演进,并逐渐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亦称现代医学模式)。

二、医学模式的研究概观

我国学者黎风在1980年第3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首次系统介绍了恩格斯的“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由此揭开了国内医学模式研究的新篇章。

1981年12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南京举行首届全国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会议以“医学、健康与社会”为主题,集中讨论了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问题,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医学模式研究的深入发展。嗣后,一大批医学工作者和卫生管理工作积极撰写文章,从医学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就医学模式的转换与我国医学发展战略、医学教育、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精神医学、康复医学、医院管理、卫生改革、医德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不少有关医学模式研究的论文或涉及医学模式的应用性

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我国医学家彭瑞骢的“谈谈生物医学模式”、杜治政的“医学模式转变与医院管理”、张一鸣等的“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其对医学教育的挑战”、周立的“浅论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宋卫国的“试论医学模式与心身医学”、刘增垣的“医学模式转变与护理科学发展”、潘定发的“浅谈医学模式转化的意义”、蒋卫东的“用新的医学模式来指导临床治疗工作”等文章深刻阐述了医学模式的内涵及其转变的实际意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识。

1982年,河北省举行了“医学发展模式”学术讨论会,深入探讨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模式问题。在肯定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同时,认为我国医学发展模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西医基本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医学科学方法为手段,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收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电子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的科研成果,协同努力,各有侧重,开展多学科、多专题、多途径的研究,创造出我国的新医药学。

1983年11月,福建省召开了“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中医发展的模式”以及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途径等有关问题。同年,《医学与哲学》编辑部撰文,指出医学模式的讨论必须逐步深入,要求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进一步阐述医学模式演变与更替的内在必然性,科学地评估生物医学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在未来医学发展中的地位,从而推动了医学模式的深入研究。

1986年8月,山西省召开了“医学辩证法”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医学模式转换问题,一致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克服了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内在缺陷,是医学观的一

大变革。同时还指出新的医学模式不能完全容纳中医学模式的科学思维方法,不能确切解释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环境以及所有自然因素对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的客观事实,继而提出两种新的模式:“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辩证统一医学模式”。近年来举办的医学心理学、心身医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方法论等有关学术讨论会、学习班,就医学模式转换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充分酝酿和讨论,进一步确立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前不久,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撰文肯定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提醒医学科学工作者研究医学模式的转变要历史地、全面地观察问题,既承认生物医学在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现代医学的科学基础,又要看到生物医学模式的消极影响。总之,医学模式的研究将逐渐渗透到医学各个领域,医学将又一次进行自我变革、自我调整,由单纯“生物医学”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

医学模式的研究已有 10 多年了,愈来愈多的医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的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客观环境、主观因素和传统医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生物医学模式仍居统治地位,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专业队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尚未渗透到医学研究的全部领域,医学教育体系尚未进行相应改革,教材设置尚未做相应调整,医护工作者、卫生管理工作以及医学院校的学生对“医学模式”知之还不多,有人认为医学模式解决不了临床病症,代替不了听诊器、手术刀,并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观点仍拘泥于传

统的临床思维方式,坚持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从而影响了医学科学的整体协调发展,影响了医学工作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延缓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进程。正如何界生同志指出的:“在我们医药卫生队伍中,相当多数的同志是在旧的生物医学的医学模式下教育出来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反复的教育,才能在思想上实现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

(纪明堂)

第二节 医学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史,任何时代,都有一个用什么世界观、方法论去研究医学的问题,都有一个医学模式或医学观的问题。医学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总是处在各个时代医学模式影响之下,不管医学工作者是否意识到,它总是受一定医学模式支配的。在远古时期,原始医学是同原始宗教神学医学观相适应的,把疾病看成是鬼神对人们的惩罚。古代经验医学是与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相适应的,它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等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来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近代生物医学是立足于生物科学基础之上,与近代实验医学相适应的,把疾病定位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上,从中找到形态或化学的变化,确定出特定原因和相应的治疗手段。现代医学是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不同角度的不同层次综合考察认识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与现代科学相适应的,把“健康”定义为“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或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现象。”认为社会心理因素同生物学因素一样,是危害人类健

康的重要的致病因素。从原始医学到现代医学,医学的发展经历了远古医学—古代医学—近代医学—现代医学四个历史阶段。纵观每一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总的特征,可以从中透视出每一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医学模式:远古时代,神学医学模式;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我们依据《外国史大事纪年》和《世界医学史》,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对四种不同医学模式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相应的时间划分。由于医学的发展呈螺旋式,又有它明显的延续性,所以有些古代医学现象延续至今,如因缺钙引起的婴儿“夜哭症”,仍有使用“贴符”以求安宁的。因此,四种不同医学模式的确切时间尚难界定,只能作相对划分。

一、神学医学模式

在远古时代,社会被宗教神权所统治,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疾病现象蒙昧不解,相信一种“超自然力”是致病的原因,因此人们把生命健康甚至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某些超自然力的救助,或求助于此种超自然的神灵保护自己,用祈祷、诅咒或崇拜灵兽等形式以平衡心理,控制情绪,祈求转祸为福,保求平安。正如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灵魂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

当时由于科学技术极为落后,人们把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自然生理现象归之于至大至远的超自然的神,月经周期认为是“虫蛟”的结果,把寄生虫传播的疾病视为是星辰或其它天上地下距离遥远的神秘物进入人体所致。天上飞

翔的鸟，崇作天上的神灵使者；地下的蛇，认为是死人的差遣。日、月、海、风、雷等，均能使人发病；古老的大树被视为超人的生物，被奉为圣树。《圣经》中有善树和恶树之说。据记载，古代有礼拜大树的仪式。古代苏格兰的克尔特人，就是将患者的衣物挂在树上以求治愈疾病的。意大利庞培城的壁画上和德鲁伊教派的记载中，可见“灵草”有巨大治疗效力的表现。犹太教用羊皮纸书写咒语，悬挂门上，当作一种避邪礼节，以防范恶魔。另有在皮肤上用各种颜色绘画图案，以“图”代“符”来防御恶魔的。也有用病人的形象代替病人，在献祭时祈求由他人代受灾祸，以欺蒙恶魔借以逃避危险。较普遍的是佩戴象征性的锁链（如佛珠、灵匣）以保佑避开邪恶，或用文身方法或病人改易姓名以改变命运。犹太人认为杀一动物可以代替罪人，或用活人献祭以安慰怨怒的上帝。古代中国人以及现在新西兰的土人认为红色可以防范恶鬼、避邪，所以佩带红色的带子、颈圈或戒指等以抵抗疾病（现在有的老年人仍习惯将一红布条系在腰上）。在远古“图腾”时代，人们借助动物的名子、形状或穿上动物皮，以使其威力附体，借以保障一族的安全。澳大利亚一些部落认为，疾病是由于魔术的作用使一块木片、骨片或石头等异物进入病人体内，巫医的任务就是用魔法将之取出，借以治愈病人。古希腊人认为，瘟疫是盛怒的阿波罗标枪向人们投来而散布的。异物通过发怒的神或通过巧妙的魔术引入，以此来解释突然发作的急性病症。当时的医生便成了超自然的神灵的人而备受宠爱，他们可以预言“新生儿的命运，或使其免受恶魔侵害”，又能呼唤死人魂灵，传授驱鬼的秘密法术。

总之，那时的所谓医学是和迷信的、宗教的、魔术的、经验的因素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视为一种巫术或魔术，医学为神学和

宗教所掌握,出现了扭曲畸形的“神学医学模式”。这种“模式”荒诞到用占星术和着魔来解释各种疾病现象,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上帝的惩罚或是魔鬼作祟,将治疗疾病视为“驱鬼”、“驱邪”,用祈祷、符咒、酷刑甚至烧毙作为治疗措施。由此,医学陷入了神秘荒唐黑暗的唯心主义神学统治中。当时解剖尸体和研究精神行为与活动是逆天大罪。这一时期西方医学史家称之为“本能的治疗时代”,是鬼神的、灵魂的、魔术的、巫术的医学,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医学模式概之为“神学医学模式”。

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医学经历了漫长的巫术、神医学之后,便脱离开它最初的蹒跚步履,带着神学医学的烙印,进入古代自然哲学“庙堂”之中。也正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帮助下,使其从巫术神学医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医学发生了第一次“飞跃”。

在古代,医学、数学、天文学等都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当时医学掌握在自然哲学家手里,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和尔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是精通医理的医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公元前500年)提出水、火、土、气“四元素”学说。认为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恩培多克(约公元前504~公元前433年)认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四种元素在数量上不同比例的配合,就像一切颜色都是画家用四种不同数量的颜料调和起来一样,世界则由具有冷、热、干、湿属性的水、火、土、空气四种元素组成。欧州“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主张“医学家必须同时为哲学家”。他借助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四元素学说来解释疾病现